



复办

南洋大学 论文集

陈国相



复办南洋大学 论文集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复办南洋大学论文集

作者：陈国相
版权 © 陈国相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国际书号：978-983-5832-02-4

出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sird@streamyx.com

出版日期：2010年8月

排版与封面设计：Janice Cheong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陈国相

[Fu ban Nanyang da xue lun wen ji]

复办南洋大学论文集 / 陈国相

ISBN 978-983-5832-02-4

1.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Alumni and alumnae.
2. Nanyang University--Alumni and alumnae.
3. Nanyang University--History. I. Title.
378.5957

复办南洋大学
论文集

怀念
我敬爱的
热心青年教育
爱护南洋大学的
父亲

献给

母校的二十一届一万二千名

校友们

“他们要我放手，……我至少要干十年，十年就有几千个南大毕业生，几千毕业生而没有一个有作为的，那我也认命了！”

（南洋大学倡办人 陈六使先生）

序言

饶美蛟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历史，可说是一页辛酸史！

南大于 1953 年由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创办南大的消息爆光后，立即获得整个东南亚华社广泛的、热烈的支持。南大的第一批学生于 1956 年正式入学，直到 1980 年 8 月 16 日举行最后一届毕业典礼，她的存在只有 25 年的光景，其后便告别了历史舞台。在一间大学的历史来说，25 年是极其短暂的。南大的消失，可说伤害了无数热爱华教人士的心！

南大的创办与往后的一些风风雨雨，对我而言并不完全陌生。我在马来亚（当时马来西亚还未成立）柔佛州出生，年幼时随父母移居汶莱，在当地接受华文中小学教育。我从小就喜欢阅读，由于当地没有华文报章，每天由新加坡空运来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便成为我的主要精神食粮。我早年对南大的认识，大部份是从报章上得来的。

我念中学时一直心仪南大，希望有一天能踏入南大的校门。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投考南大，因为自己知道，即使考取了，我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负担我到南大的昂贵学费与生活费。在某些机缘下，我后来去了当时学费和生活费都比南大便宜最少一半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深造。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我有幸受聘到南大担任经济系讲师一职，在新加坡总共教了约一年半的时间，其后受聘回到我的香港母校任教。我在南大时，身份虽然不是学生，但总算圆了我的「南大梦」。我在南大教学期间，生活得很是愉快，与学生和同事相处得很好，也很享受每周从南洋谷坐公交车下坡的时光。南大从创办那天开始，一直在风雨飘摇之中，我在南大的那段时间也不例外。首

先，薛寿生校长未约满而突然离职，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据悉是受到外部的压力。1975 年李光耀委派了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出掌南大，根据李光耀的回忆录说，他已“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李昭铭）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见《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 11 章：一种共同语，页 173）。李光耀的目的，此时已招然若揭，他非要把南大改成一所英文大学不可，即使最后关闭南大也在所不惜！

一九八零年，南大在表面上是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一所崭新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实质上是南大被新加坡大学吞并，南大被关闭了。长时间以来，李光耀及其同路人一直都不敢明言南大被关闭的事实，如果这样说的话是“政治上不正确”。但李光耀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说，南大是被关闭的。今年 1 月，李光耀在接受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地理》杂志时说，“他后悔没有早点关闭南洋大学，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因素，担心在接下来的大选举中会引起选民的强烈抗议。”李光耀现在似乎再也没有选择上的考量了。

李光耀除了说“南大早就应该被关闭”这句话有点新鲜之外，他对南大的指责可说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南大校友和社会人士早已耳熟能详，比如他说：南大学生的质素低，英文差，学术水平低，毕业生难于在职场上找到职业等（他在接受《国家地理》杂志的访问时还进一步说，学生“单靠华文无法过活”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和看法是，南大学生的英文平均水平或许不及新大生之外（但南大学生的华文平均水平肯定高过新大许多，部份旧新大的华裔生中更有不通晓华文者），其他的指责可说一派胡言。李光耀还三番四次地说：“由于学生的素质差，南大降低水平让他们毕业，结果文凭变得没有价值，当他们找工作时，反而把大学文凭藏起来，改以中学文凭取代。”（见《国家地理》杂志李氏访问稿。）我在南大任教期间，从未听过有任教的老师降低考试水平让学生毕业。而我个人的任教经验，南大同学普遍学习认真，学术水平一点也不低，跟其他外国较好的大学相比，可说毫不逊色。李又说，南大毕业生在找工作时把大学文凭藏起来，以较低学历应征。我在新加坡时，已读到李光耀对传媒说过此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再提到，到了 2010 年的今天他还在老调重弹。事实是否如此？我

不敢说没有某一两个特殊的案例，但肯定不是广大的南大毕业生。李光耀除了以偏概全外，是否有必要喋喋不休地说了又说，一再伤害全体南大毕业同学？事实上，个别大学生因某些理由以较低学历应征一个职位，在北美也有发生。至于说南大生找不到职业，我想问李资政：南大毕业生有长期失业的吗？人数又有多少？有数据支持你的说法吗？我希望李资政今后再重复说这“事例”时能够提供我们一些答案。

我于 70 年代在南大任教时，最后使我眼界大开的是，李光耀等政府领导人经常公开地批评南大学生学术水平低，英文不好，难以找到工作等等。环顾全球，我深信找不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本国的一所大学如此不停地批评与苛责。我想，国家领导人不加以褒奖本国一所眼中钉的大学也就罢了，但很少会想把此大学批评得体无完肤，想把她置诸于死地的。奇怪的是，新加坡的舆论对此却是一片沉默！

二零零二年夏天，我随南大香港校友会代表团出席了在沙巴举行的「第八屆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会」，有幸以前南大一名教员的身份受邀在「承先启后、自强不息、迎新世纪」的研讨会上作为其中一个主讲人。我当天的发言，其中一个观点是李光耀政府并未有起到一个民选政府的责任来辅助南大，建设南大。我以我熟悉的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与南洋大学作了一个对比，因为这两所大学的背景虽不尽相同但有些相似。中大创办于 1963 年，是由新亚、崇基与联合三所民办专上学院合组而成（这三间学院名称迄今仍在，属于中大的成员书院）。中大早年的学生以香港的中文中学毕业生为主（中文中学相当于新、马等地的华文中学），大学成立后受港府全面资助。中大成立之前已有一所英殖民地政府成立的以英文为媒介语的大学（即香港大学，简称「港大」），她与当年南大的姐妹大学「新大」（前身为「马大」）性质相同。港英时代，香港政府已平等对待中大与港大，使中大能与港大公平竞争。今日，中大与港大的收生成绩不分伯仲，囊括了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生中的绝大部分尖子（目前香港仍有英文中学与中文中学之分，但会考试卷则划一）。在学术的表现上，中大绝不比港大逊色。2006 年港府「港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曾对香港八所公立大学的

「研究表现」(RAE)作了一次全面评估,评估采用国际标准,结果中大的研究表现指数比港大为高。以国际声誉而言,中大亦不逊于港大。

中大于1963年成立时只有文、理、商三个学院,今日她已发展成为一所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大学,除文、理、商学院之外,还有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建筑学院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反观南大,她在新加坡独立后除了得到政府的资助外,却没有中大那么幸运。我在南大时,生物与历史二系因收生不理想,已面临新加坡政府的威胁拟予以关闭。我在沙巴的研讨会上说,如果新加坡政府能给予南大与新大同等的支持(正如港府对待中大与港大),协助南大办工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甚至法学院,加强其师资阵容,南大的命运不会遭到关闭的下场。我想,即使新加坡的中学语言政策改变了,南大也不致消亡。我个人绝不是文化沙文主义者,我完全同意,英文是一国际语言,非常重要,南大生有必要学好英文,但我也认为华文有它的经济与文化价值,不容忽视。到今天,我还是想不到有更好的理由,南大的被关闭,不是源于政治因素。我们只要审察李光耀长期敌视南大的言论,便可得到这个结论。

我最近翻阅了陈六使先生与前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于1958年3月30日在南大落成典礼上的两篇演辞,这两篇演辞的一些内容值得我们深思。陈六使在演辞中说:“回忆一九五三年本人创办本大学,首先表现热切同情者,即其时在新加坡辅政司任内之顾德爵士。爵士阅报,获悉有关设立本大学消息,立即约晤本人,奖勉拳拳,愿快睹本大学之实现,并惠允给予注册问题校址问题以及其他筹备工作上一切必需之协助。”而顾德前总督在致辞中也提到这一次的约会:“这一次的会见,是这伟大计划的开端。如今眼见这个计划的实现,本人觉得特别高兴。”接着他又说:“本人以为这个计划的实现并非十分由于本人在会见时的鼓励,而是得力于华人社会和华人领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使创办大学计划获得成功。”我没有必要在此美化一个英殖民地高层代表的言论,但我相信这是顾德爵士当时的由衷之言。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时代虽没有承

认南大的学位，但也没有把南大赶尽杀绝。讽刺的是，关闭南大的却是一个民选的、独立的新加坡政府，令人无限欷歔！

顾德总督在南大落成典礼演辞中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很有道理及远见的：“诸君创办南大须抱有使南大的品质和世界其他完善大学一较长短的决心。须知创办一间程度低劣的大学，倒不如没有大学的好。本人确信南大创办人的目的是超越的、高尚的，各学院教职员亦具有同样理想终力来负起他们被委托的重任。”诚哉斯言！这句勉励的话出自英殖民地者，可说颇为难得。这比独立政府的领导人不断苛责南大的言论好得多了。南大的不幸死亡，是因为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没有给予她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

南大第一届史地系（地理组）毕业校友陈国相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也是众多南大校友所熟悉的一名学长。我在南大任教期间即听闻陈国相博士的大名，谈论者都说他是南大的坚强爱护者，令我肃然起敬，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识荆，直到三、四年前我才有机会第一次与国相先生见面，地点在香港。国相先生当时正在为南大复校事到处奔波。他到香港是搜集在港的南大校友对复校的意见。我受南大香港校友会主席林顺忠先生之邀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事实上，在与国相先生见面之前，我已陆续拜读了他的多篇关于南大问题及其复校的论文。国相先生可说文如其人，热情诚挚，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见解，读他的文章肯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国相先生是一个南大的有心人，他把他过去写的近30篇有关复办南大的文章和有关报告编辑成一本论文集。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专著。不管将来南大能否复办成功，或以某种形式复办，这些文章和报告都很值得大家一读再读。南大的历史问题今天不能解决，但终有一天会解决的，它终将还南大一个公道，还历史一个公道，我们且拭目以待！国相先生的多篇南大复校论文，是检视南大历史问题必读的参考文献。国相先生的论文集出版在即，征序于余，极为荣幸，在感激之余，我愿向广大的南大校友、热爱南大的社会人士以及对南大问题有兴趣的读者极力推荐国相先生的这本专著。

饶美蛟教授简历

饶美蛟教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优异）（主修经济，副修会计与财务），其后负笈美国与加拿大，获美国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经济学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工商管理硕士及西蒙菲沙（Simon Fraser）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饶教授于 1973 至 75 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77 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英制），其后擢升为高级讲师及教授（Reader），1992 年又晋升为管理学讲座教授。他曾于不同时期担任管理系主任，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主任及商学院副院长等多个行政职位，其间尚出任逸夫书院校董多年。1983 年 9 月至 1984 年 7 月，饶教授获英联邦大学协会研究院士奖学金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一年。1995 年受邀出任岭南大学副校长一职，并兼任该校香港商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其后又出任教与学中心主任。在岭大服务期间，饶教授主理大学有关教学及学术研究行政及质量保证工作，为岭南于 1998 年获正名为大学之功臣之一。2008 年 7 月自岭大荣休。除行政工作外，饶教授亦获中国内地多所著名高校如南京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及山东经济学院等聘为顾问或客座教授。

自岭大荣休后，饶教授获聘为该大学「荣休管理学讲座教授」，2010 年初受澳门理工学院之邀出任该院「特聘高级顾问」，协助该学院进行学术评审工作等事宜。

饶教授曾为多项学术奖项或奖学金之领受人，包括耶鲁学术优异奖学金（设于中大新亚书院），美国福特基金奖学金（设于美国范德堡大学）及英联邦大学协会研究院士奖学金（设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等。

饶教授之学术专长为策略管理、人力资源与跨文化企业管理及工业研究，曾在有关领域发表中英文专著二十五本（包括编着），论文逾一百三十篇，散见欧美各国一级或著名之国际企业及管理学学术期刊，包括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IB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Asian Survey, World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World Investment 等，或刊于欧美著名出版社如 JAI Press Ltd., M.E. Sharpe, Inc., Routledge Publishers, Prentice-Hall, Clare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ter de Gruyter 等出版之管理专书内。2010 年，饶教授在《国际商业期刊》（JIBS）发表之一篇关于中国合资企业之实证性论文，其引用率获一项国际调查评为全球排名第七。此外，他于 2006 年在《国际商业期刊》上发表之另一篇关于人力资源之学术论文于 2008 年获美国最具影响力之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评选为「卓越论文」之一。

除担任大学教学、研究及高层行政工作外，饶教授亦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及跨国及香港大企业之邀请担任顾问或培训工作。饶教授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铜紫荆星章（Bronze Bauhinia Star）勋衔，以表彰其多年来对香港高等教育发展之贡献。

（2010 年 4 月）

前言

我在一九五九年底走出南洋大学校门后，曾经在华文报馆工作八个月，后来侥幸获得《加拿大文化协会》奖学金。出国时，作为一个学地理的学生，只图利用别人的钱多看看世界，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进研究院，最终获取了最高的学术文凭。那是加拿大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以及同学间隐形的良性竞争和热烈的支持的结果。

更重要的，在这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鼓舞我力求上进，不仅要好好地表现给那些瞧不起南大人的家伙看看，更要用所学的知识为支持我们的人办一些好事。这种力量来自对母校的感激之心。我是用英校剑桥普通文凭报读南大的，当时在中正中学还未唸完高三，乳臭未干，只因为向往南大，在父亲的热力支持下，便步几位已经毕业的朋友后尘，为了能被录取，也担心中文水平不足，赶不上用中文教学的课目，先报读现代语文系，后来还是被在史地系的朋友吸引过去了。初办的南大，体制尚未健全，师质差缺，设备不足，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安定静谧的学习环境。我们通过小先生制，集体学习与研究，旅行考察，出版学术书刊杂志，不但完成学士课程的要求，也充实了有关的课外知识。大学也让我们实行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管理自己的校内生活，和校外（包括国外）的学生相互支援联系，增强了同学间合作和办事的能力。我能在四年间获得充分的书本知识和处世教育与经验，并以这作为基础，顺利完成研究院的学习，和成功的走完36年教学生涯，不能不归功于母校的培育。

我因此不能坐视母校从此在地球上蒸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母校是在成长过程中因别有居心者依仗强制政治手腕而被腰斩。她是因为坚持发扬“南大精神”而招来灭顶之灾。别有居心者现在竟猫哭老鼠似的推崇“南大精神”。但是说什么发扬南大精神

都是徒劳的，除非我们把南洋大学重建起来！

复办南大的呼吁，自从母校在 1980 年被关闭后，虽校友们不时提过，却还得等到韩素音老师在 1992 年多伦多举行的第一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上登高一呼，响应才开始普遍，热烈。此后，在每两年一届的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上，都有重复提出。可是，空喊了 14 年之后，还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于是，作为多伦多讨论会的主持人，见证了韩素音老师在讲台上的呼吁，觉得有责任提醒大家，口号必须以行动来实现，没有行动的支持，希望是空的，复办南大的担子，不能等别人来挑，只能由从南大得益最多的校友来牵头。詹文义教授说得好，“南大校友必须牢牢记住，陈六使等老一辈的南大创办人是把希望寄托在南大生的身上的。他们期望南大栽培出来的子弟，能接他们的力，继续把南大的使命发扬光大。”因此（请见本文集第 27 节），我在 2006 年墨尔本的联欢会上邀请校友和我一道，展开一项“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考虑“复办”是否可行，如何进行，不可行又怎办，并准备向接下一届的联欢会提出报告，让校友讨论、决定，并尝试付诸执行。

在几位校友的帮忙下，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新马，港澳，澳洲和加拿大会见了约 500 名校友，编写了《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报告》。和那么多的校友交谈，使我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让我提出了之前未曾仔细考虑过的“化整为零，遍地开花”的新构思，建议在东南亚各国恢复华文教育的基础上，分别建立起一系列的第二代南大。报告于 2008 年九月呈给《北京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的网站》（www.beijing2008.nantahchoir.com/index1.html），以及《多伦多南大校友业余网站》（简称《南大站》）（www.nandazhan.com）。本来还想印发给于会的校友，但没获得筹委会的同意。

没想到，一部能决定母校前途的报告书，却被一个人以“报告书带有争议性”为借口而被拒绝。经过争取，筹委会最终答应安排一个交流会，凡是校友想提出来的问题，都可在交流会的 90 分钟内讨论。还好，只有两个相关的问题被提出，即“网上南大”和《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报告》。但事实上，因筹委会并没有按会议议程，更没有捉紧时间开会，只留 30 分钟给交流会。“网上南大”主讲者用了 10 分钟发言，我也只用 10 分钟简单说明我在《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报告》中所做的建议，以便能省下来一些时

间，听取台下校友的意见。有四名校友接着发言，都是支持我提出的“遍地开花”的构思的。

虽然许多持有诚挚认真态度的校友对座谈会的过程不感满意，会后有许多迹象显示“遍地开花”的构思得到校友的认可，而且也有人开始执行其中的一些建议。但是不管有无共识，这还不足以作为复校行动的基础。显然，在北京的联欢会上，我们失去了解决母校前途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还得继续努力商榷，就“复办南洋大学”的问题，争取更广泛的共识。

正是为了使研讨能顺利进行，我特地将我个人在近期就“复办南洋大学”的问题，所发表过的拙文收集成册，呈献给校友们，抛砖引玉。

《复办南洋大学可行性调查报告》是我编写的，在今后的讨论中，为了对它负责任，我当然将继续为它辩护，尽管我不排除会有校友提出更能为大家接受的意见。“复办南洋大学”不是我个人的事，首先，报告是在和不少校友交谈过之后，总结大家的意见而完成的，但是它仍得由更多的南大人来审视，最后交给各地校友和关心南大的社会人士一起定夺，执行。复办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能使它实现，也不能在许多人不知就理的情况下进行。再者，按一般惯例，提出建议的一方，不宜继续领导建议的执行，免得使一件属于大家的事个人化，我最多只能以一个普通校友的身份，继续参与校友会领导的执行工作。

到目前为止，依我个人的估计，讨论意见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统一。新构思所依据的现实，已基本上被接受。东南亚国家意识的建立和巩固，已淘汰单一华文大学为整个地区华社服务的境局。我们已经不能在原来的框盒子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幸好东南亚各国也有意恢复华文教育，有利于华文大专的突局。其中某些教育机构固然尚未能满足新马华社对优质华文学府的要求，被某些人以狗眼看人，轻视它们，但是它们毕竟是在逆境中迅速发展的可喜可贺现象，有可能形成地方上华族的文化教育中心，倘能获得区域性的合作与支持，有成为第二代南洋大学的潜能。

“遍地开花”的新构思，也许表面看是打退堂鼓，因为它化整为零，确定了1953-1980年的南洋大学不再单独重现。可是在这21世纪的年代里，1953-1980年的南洋大学是否应该照搬出来？它有没

有重现的可能？在东南亚各国要求独立发展，为自己的国民提供公民教育的大气候里，某一国家的大学，有没有条件，或义务受托成为泛区域性的教育机构？“化整为零，遍地开花”不是后退，而是在新的，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下走一条更实际的路。

“遍地开花”的新构思最受到校友们注意的部分，是它对马来西亚三所华文学院予以定位，为它们今后的发展，助一臂之力。这也不难理解，新马南大校友，眼看着南大被消灭，新加坡华文中小学实质上转型为政府英校，只能指望因南大被令不能招收马来西亚中学生而出现的三所华文学院，迅速升格为大学，好让新马华人能继续保有维护他们语言文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再次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华教体系。不论三院各自成为大学，或是合并成单一大学，不论大学采用什么名字，重要的是，南大人可以把它看成是老南大的重现，而聊以安慰。

多伦多南大校友会的几句话，值得重复：“我们赞同及支持交流会的新构想与新方向的基本方针。我们同意交流会主持人孙勇南校友的报告所说，“遍地开花‘复办南洋大学’目前能够迈开的第一步，莫过于协助这三间民办华文学院……完成申办大学所需的学术条件……。”我们认为这是南大校友回馈母校和民族教育的现实和务实的途径。今天这三间学院申办大学所需的条件正好是南大校友所具备的：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专长与经验。假如这三间学院的所需和南大校友的经验与专长能取得恰好的配合，南大校友完成回馈母校和东南亚民族教育的意愿将指日可待，东南亚华裔再度兴建一所以华文为主的综合大学的要求与努力也将早日实现。回顾当年创办南大的历史经验，大家把民族教育利益放在前头，不分阶层、不分区域、不计名利、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没有理由不能早日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望。”（《南大站》2009-03-27）

在讨论的过程中，有校友提出，鉴于徐冠林博士曾自称理大是南大的“配得上的继承者”（worthy successor），我们有责任将争论平息下来，帮助理大，使它能确实成为南大的“配得上的继承者”。我觉得，提出这种意见的校友的毛病在于他们盲目地接受徐冠林的话。我们不是对徐博士的人格表示怀疑，但是必须指出他的判断是错误的。理大现在是一所和国大没有两样的英文大学。其